

【专家论坛】

矿难治理对策:一种劳动经济学分析视角

张凤林, 李保华

(东北财经大学 富虹经济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3)

摘要: 矿难频发已成为中国煤炭行业发展的“毒瘤”, 必须加以根本性的解决。运用劳动经济学的享乐工资模型分析中小煤矿矿难事故问题, 指出矿工的特定劳动供给行为和矿主基于利润最大化的劳动需求行为共同构成了矿难事故的成因及条件。因此, 治理矿难必须从调整矿工的劳动供给行为与矿主的劳动需求行为两个方面入手, 即在享乐主义工资模型动态化的基础上提出对应的治理对策, 方能达到治本的目的。这些治理对策包括改善社会整体就业环境、提高矿工整体薪酬水平、逐步提高矿难死亡赔偿标准等。

关键词: 劳动经济学; 矿难; 享乐工资模型; 劳动需求; 劳动供给

中图分类号: C971/TD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7)01-0006-06

How to eliminate coal mine disaster: study from view point of labor economics

ZHANG Feng lin, LI Bao hua

(Fuhong School of Economic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3, Liaoning, China)

Abstract: The high frequency of coal mine disasters has become the cancer of mine industry. It should be resolved radically. This paper analyzes coal mine disasters with the hedonic wage theory in labor economics, and believes that both the coal miner's special labor supply and the coal master's labor demand based on profit maximum constitute the causes and condition of coal mine disaster. Therefore, in order to eliminate coal mine disasters radically, coal miner's labor supply and coal master's labor demand should be adjusted respectively, that is, the necessary countermeasures based on the dynamic of hedonic wage theory should be made, including bettering social employment environments, raising higher wage scale of whole peasant workers, and improving compensation for the dead coal miners, and so on.

Key words: labor economics; coal mine disaster; the hedonic wage theory; labour demand; labour supply

0 引言

近年来,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全面、高速发展, 作为国家主要的一次性消费能源的煤炭产量每年都在高速增长。与此同时, 煤矿生产中的事故也与日俱增, 特别是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矿难事故频发,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严重关切。相关统计资料显示, 中国

的矿难发生频次、严重程度和死亡人数已经处于世界的前列, 不仅远远高于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 而且也远远高于印度、南非等欠发达国家。20世纪末21世纪初, 中国煤炭行业百万吨煤死亡人数始终维持在5人上下, 可以简单地认为中国煤炭产量和矿工死亡人数呈线性关系, 即伴随着煤炭产量的增长, 矿工死亡人数也在以同样的比例增长, 但线

收稿日期: 2006-12-24

作者简介: 张凤林(1954-), 男, 辽宁沈阳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性关系的斜率(即死亡率)基本保持不变;而同期美国百万吨煤死亡人数平均值为0.03左右,澳大利亚为0.02左右,俄罗斯为0.5左右。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度百万吨煤死亡人数平均值为0.45左右,南非为0.25左右。煤炭产业死亡人数的国际数据表明,降低煤炭行业死亡率已经成为行业发展的突破口和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的迫切要求。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一探讨。

1 文献回顾

关于矿难发生的原因,国内学术界与相关部门曾经展开了深入分析,提出过不少见解。比如,矿业工程学家主要从煤矿的矿山地形结构、瓦斯浓度等角度去探求煤矿生产事故的原因及其解决方案;而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则更多地从主观意识、官员寻租、监管体制、产权、产业规制、制度演变、企业管理等角度分析矿难频发的原因。

1.1 国际对比

有的学者从国际对比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矿难发生的原因,并提出对中国矿难治理的借鉴意义^[1]。其中,王庆一(2005)分析了美国政府管理小煤矿的策略:依法行政,一视同仁;开办煤矿,权责分明;信息服务,引导投资;合同保障,稳定产销;安全监督,严格执法;关闭矿井,消除隐患;从重处罚,高额赔偿;强制培训,政府拨款;依靠科技,保证安全;保护环境,预先交费等。

1.2 政府监管体制

有的学者从政府监管体制和政府应该承担的监管责任的角度对矿难问题进行了详尽的阐述^[2-4]。其中,肖兴志等(2006)构建了中国政府监管体制的一种模式;王绍光(2005)首先用数据证明中国煤矿事故发生率和矿工死亡率远远高于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乡镇、私人小煤矿的死亡率过高,从而提升了中国的整体矿工死亡率;其次,采用历史分析方法分析发现,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煤矿事故率总体上在不断地降低,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末期先后出现了上升的趋势;再次,从监管者、被监管者(国有的、乡镇的、私人的煤矿)、矿工、地方政府等角度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特别指出缺乏训练有素的监管人员是监管体系薄弱的重要原因所在;最后,对政府监管体系做了历史分析和展望,指出中国政府为了适应非国有化和不断市场化的趋势,已经逐渐改变原有的治理模式,其结果必然是干预主义政府的萎缩和监管型

政府的不断崛起。

1.3 产权扭曲

有的学者分析了产权扭曲时可耗尽资源企业经营者的决策模型,认为过度的产权扭曲是中国矿难频发的根本原因^[5-6]。

1.4 人力资源开发

有的学者从矿工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对矿难问题进行分析,指出开发和提高矿工的人力技能已经成为当务之急^[7-8]。

1.5 企业治理结构、制度设计

赵杰(2005)^[9]、钟开斌(2005)^[10]、孟淑萍(2005)^[11]等分别从企业治理结构、制度设计、公共治理结构、死亡赔偿标准制度设计等制度方面探析矿难问题,指出健全、合理、坚实的制度体系是解决矿难问题的关键。方晓波(2005)^[12]借鉴专门对于缺乏责任机制的非盈利性组织的管理模式DADS法,将其应用于煤矿的监管。在DADS法中,D(Disclosure)表示信息的披露;A(Analysis)表示信息的分析;D(Dissemination)表示信息的发布;S(Sanction)表示惩罚。其对DADS方法运用于中国的环境进行了分析,并列出了煤矿监察部门的内容体系。

以上这些分析虽然从不同方面触及了煤矿生产事故的原因,但是他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这就是作为煤矿生产主体矿工的劳动供给行为以及矿主的劳动需求行为对煤矿事故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将难以从根本上有效地减少乃至避免煤矿生产事故、特别是矿难的发生。

2 矿难原因探析:基于劳动经济学的一种新解释

矿难作为煤矿生产过程的一种突然破坏或崩溃现象,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诸如地质构造、自然条件、物质技术条件、工艺水平、员工素质、管理水平等。如果假设这些因素给定,那么矿难发生的概率也就给定了。在这种情况下,实际发生的矿难数量基本上可以看作是煤矿生产规模的一个线性函数,或者说煤矿生产的一个副产品。如果设煤矿的生产函数为

$$Y = f(K, L) = AK^\alpha L^{(1-\alpha)} \quad (1)$$

式中: Y 、 K 、 L 分别代表煤产量、资本设备投入、矿工劳动力投入; A 为某一假定的外生常量系数,通常被看作技术水平; α 与 $1-\alpha$ 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再设 M 表示矿难事件数,

矿难事件的发生概率为 $p(0 < p < 1)$, 那么显然有

$$M = pY \Rightarrow pf(K, L) \quad (2)$$

同时, 在给定资本和设备的条件下, 煤矿生产又是矿工劳动投入量的增函数, 由此又可以推知, 矿难事故与矿工的劳动投入量正相关, 即

$$M = pY \Rightarrow pf(\bar{K}, L) = pf(L) \quad (3)$$

这表明, 在给定其他外生或内生条件的情况下, 矿难数量与矿工劳动量呈增函数关系。换言之, 矿工劳动供给的增长及其通过矿主的劳动需求而转化为现实的劳动投入, 便构成了煤矿生产增长从而矿难事故数量上升的一个重要条件。那么, 为何许多中小煤矿在矿难频发的形势下依然能够得到持续不断的矿工劳动力供给呢? 回答这一问题, 就需要研究矿工的劳动供求关系以及中国中小煤矿特定的劳动供求行为特征问题。

2.1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中小煤矿矿工队伍及其低风险厌恶的劳动力供给行为

劳动经济学原理表明, 作为工作与闲暇决策的结果, 理性经济主体劳动供给行为的目的是要实现个人或家庭效用最大化。一方面投入劳动就要放弃闲暇, 这意味着效用损失, 便需要给予补偿, 即支付工资。因此, 工资是劳动供给的重要激励因素; 或者说, 劳动供给是工资的一个增函数。另一方面, 从企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来看, 由于基于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行为总是把对生产要素的需求确定在等边际的水平上, 或使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 故而企业的劳动需求总是工资的减函数。这样, 在竞争性市场条件下, 通过供求双方的作用就决定了均衡的就业量与工资水平。这里均衡的含义是, 劳动者在一个就业岗位得到的工资一般等于(或不少于)在其他就业机会中可能获得的工资, 而某一企业对同类劳动力支付的工资水平一般等于(或不多于)其他企业支付的工资^[13]。

然而, 当市场环境变化时, 上述均衡将要发生变化。一个重要变化是由工作场所的非货币方面因素的差异引起的。例如, 环境肮脏、恶劣的工作与环境整洁、舒适的工作相比, 对于同样劳动时间和同样劳动强度的工人来说, 就不能再支付同样的工资了, 而是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资以补偿前者给工人带来的更大的负效用。这样, 即使在竞争性的市场上也会形成“补偿性”工资差别。换言之, 正是由于补偿性工资差别的存在, 才使得那些环境肮脏、恶劣危险的工作岗位仍然有人去冒险。生产过程中的安全性(或者它的反面, 即出现事故的风险性), 显然是工作场

所的非货币差异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因此, 那些由于技术或自然等方面的原因而导致发生事故概率较大的高风险工作与那些事故概率较低的安全性工作相比, 必然也要支付较高的工资。当然, 究竟哪些人选择环境较差或者高风险的工作岗位, 哪些人选择环境较好或者低风险的工作岗位, 还要依人们的主观偏好、对恶劣环境或风险的厌恶程度为转移。对恶劣环境或者风险的厌恶程度越大, 理性的主体就越不愿意去环境较差的高风险工作岗位, 这时若要激励人们去工作就必须给予更高的工资作为补偿, 反之亦然^[14-15]。

现在分析中国中小煤矿的劳动力供给情况。就大多数情况来看, 目前中国的中小煤矿的主要劳动力资源是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即农民工构成了中小煤矿矿工队伍的主体。正是这种特殊的劳动力来源决定了中小煤矿矿工的劳动供给具有中国特色。第一, 由于其原先是作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 在农村的机会工资几乎等于零, 而在城市其他行业或岗位就业的机会也极为有限, 故在城市中除煤矿以外的产业就业的机会工资也不高。这就决定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矿工的劳动力供给的增加, 即使在煤矿企业的工资并不很高的情况下仍然会吸引大批的农民工加入矿工劳动大军。第二, 农民工所处社会阶层经济地位的低下和文化的落后使得他们缺乏风险意识, 或者说风险厌恶程度较低, 这从很多矿工对于矿难中遇难的同伴所表现出的木然态度以及此后依然听天由命的宿命态度可见一斑。农民工的这种低风险厌恶态度与传统经济学的假定是不一致的, 它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 在煤矿这样高风险的行业, 不需要多么高的补偿性工资差别就能雇到足够多的劳动力。

上述情况决定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矿工队伍本质上属于一种廉价劳动力。这样, 如果煤矿企业在不损害利润的前提下只要适当地提高矿工的工资, 就会引致劳动力对于高风险工作的近乎无限弹性的劳动供给。因此, 在矿难频发的情况下, 矿工劳动力供给不但不会减少, 却仍然增加。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可以用图 1 来说明, 矿工的偏好曲线用 U_2 来代表, 它与高风险厌恶型的人群的偏好曲线 U_1 不同, 因而他们的劳动供给通常是更倾向于选择高工资与高风险相结合的趋向于右上方状态。

2.2 以短期利润最大化为特征的劳动力需求行为

自中国煤炭资源经营管理体制逐渐放开以来, 煤炭行业一个明显的特征是, 私人民间资本进入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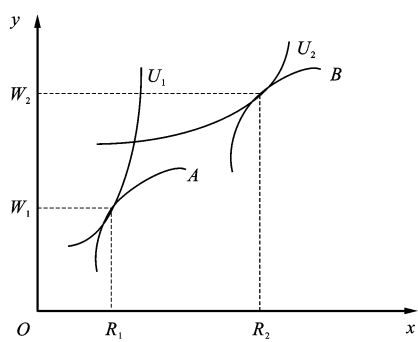


图 1 享乐工资模型: 解释矿工和矿主的结合

呈不断增加态势,在产业形态上表现为中小类型的煤矿数量占据主体。相关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共有煤矿 3 万多个,其中中小煤矿多达 2.1 万多个。这部分煤矿企业的资本量还无法与国有煤矿企业相比较,但其的确是中国矿工劳动力队伍的主要吸纳者,尤其是农民工出身的矿工劳动力的吸纳主体。

在矿工劳动力的需求方面,中小煤矿企业与大型国有煤矿企业相比较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具体表现为:第一,前提假设不同。中小煤矿企业由于其私人资本的属性决定其矿工劳动力需求必然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即等边际原则。历史原因和制度因素使国有煤矿企业在劳动力需求上并非完全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在特定历史环境和制度安排下,其在用工上还承担着一部分社会功能。如大量非采掘作业人员充斥到行政管理和后勤岗位,造成了人浮于事的局面;办医院、幼儿园、中小学等与生产无关的附属机构,增加了企业包袱,降低了市场竞争力。第二,用工制度灵活性的差异。国有煤矿企业的矿工队伍同其他行业国有企业一样,属于国家正式工人,其用人要经过试用、考察等一系列烦琐的组织程序。近几年,由于国有煤矿经营体制的转换加上部分人才的流失,其用工制度也逐渐发生改变,逐渐向利润最大化转化;中小煤矿企业与之相比要灵活的多,在国家监管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随时来,随时走”成为其用人随意性的显著特征。第三,矿工的人力技能水平需求与培训不同。国有煤矿由于累计的资本投入和不断改进的机械化生产条件导致其对矿工的人力技能要求较高,且其对矿工后续的技能培训做的较好;而中小煤矿企业由于其开发时间较短,资本累计投入量和生产机械化水平远不如国有煤矿雄厚,其对矿工劳动力的人力技能需求相应地较低,这也符合从农村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的特征,使得农民工出身的矿工更容易和中小煤矿企业形成现实劳动供给关系。由于农民工文化水平的落后,其对于自

身的权益保护较为漠视,加上中小煤矿在后续的人力技能培训上也没有及时跟上,为安全生产埋下了隐患。总之,大型国有煤矿企业和中小煤矿企业在对矿工劳动力需求上是不一致的,后者的“低门槛”标准也为其没有严格的安全设备投资埋下了伏笔。

在矿主成本投资中,除矿工劳动力需求成本外还存在着对安全设备投资的需求成本。中小煤矿企业在矿主利润最大化、国家监管体制不健全以及矿工队伍漠视自身的生命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导致其不愿对安全设备投资过多。因为他们进行安全设备投资的成本较高,加之中小煤矿以往的投资少,所以进行安全投资及其连带投资成本可能比较高;而大型国有企业以往投资比较厚实,可能不需要那么多连带投资。这就使得在煤矿采掘行业中,中小煤矿企业呈现高风险的工作环境特征,而大型国有煤矿企业的伤害风险程度相对较小,这就造成了两类煤矿企业对于矿工劳动力需求形成“分流”:一部分风险厌恶程度较高的矿工会选择在大型国有煤矿企业工作,而另一部分风险厌恶程度较低的矿工(尤其是农民工出身的矿工)会选择在中小煤矿企业工作。从本质上讲,选择煤矿行业就意味着比较高的劳动危险性,而选择不同类型的煤矿则表示在工作危险性的基础之上再次选择不同的风险发生概率。在图 1 中,中小煤矿矿主的等利润曲线用 B 来代表,大型国有煤矿企业的等利润曲线用 A 来代表。显然 B 曲线的斜率要大于 A 曲线的斜率,这就意味着 B 类型的煤矿降低风险系数的成本要高于 A 类型的煤矿,从而呈现出高风险的特征,他们与风险厌恶程度较低的矿工(尤其是农民工出身的矿工)的高工资、高风险结合趋向于图形的右上方。

2.3 特定的劳动力供给与矿主基于利润最大化的劳动需求的结合导致矿难频发

通过图 1 分析矿工(尤其是农民工出身的矿工)特定的劳动力供给行为和矿主在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劳动力需求特征,可以推知二者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更容易结合成高工资、高风险匹配。

图 1 中,曲线 B 的斜率要大于曲线 A 的斜率,低风险厌恶程度的矿工用曲线 U_2 表示,高风险厌恶程度的矿工用曲线 U_1 表示,曲线 U_1 的斜率大于曲线 U_2 的斜率。 U_2 类型的矿工与 B 类型的企业相结合,即低风险厌恶程度的矿工与中小煤矿企业相结合; U_1 类型的矿工与 A 类型的企业相结合,即高风险厌恶程度的矿工与大型国有煤矿企业相结合。曲线 U_2 与曲线 B 的切点在 x 轴(表示伤害风

险)和 y 轴(表示工资率)上的影射点分别为 R_2 和 W_2 , 分别表示低风险厌恶程度的矿工的伤害风险系数与工资率水平。曲线 U_1 与曲线 A 的切点在 x 轴和 y 轴上的影射点分别为 R_1 和 W_1 , 分别表示高风险厌恶程度的矿工的伤害风险系数与工资率水平。显然 $W_2 > W_1$, 但同时也伴随着 $R_2 > R_1$, 这种结合是享乐工资模型在煤矿行业的经典再现。低风险厌恶程度的矿工 U_2 (农民工)与中小煤矿企业 B 所形成的这种高工资、高风险结合使得此类煤矿企业没有安全设备投资的动机, 矿工的高工资率、低风险厌恶的偏好让中小煤矿企业觉得“出事”后进行赔偿比安全设备投资更“经济”, 加之外部监管体制的不健全, 中小煤矿企业矿难频发就不足为怪了。

3 矿难治理对策: 基于享乐工资模型的动态化

许多学者对矿难治理问题提出了丰富的建议, 这些建议对解决矿难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但煤矿生产归根结底要回到矿工的劳动力供给及矿主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上来, 不解决矿工特定的劳动力供给行为和矿主的劳动力需求特征的“偏差”, 就无法从根本上遏制乃至消灭矿难的发生。因此, 本文的治理思路就是依据“釜底抽薪”的原则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具体讲, 表现在图 2 中就是要把切点 T_2 向原点方向移动, 使其逐渐与切点 T_1 相靠近, 即曲线 U_2 的斜率变大, 逐渐向曲线 U_1 的斜率看齐; 曲线 B 的斜率变小, 逐渐向曲线 A 的斜率看齐。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会不断形成新的切点, 假设存在一点 T_3 , T_3 与 T_2 相比较, 其在横轴上的影射点 R_3 要小于 R_2 , 从而降低了煤矿的伤害风险系数, 从根本上不断解决矿难频发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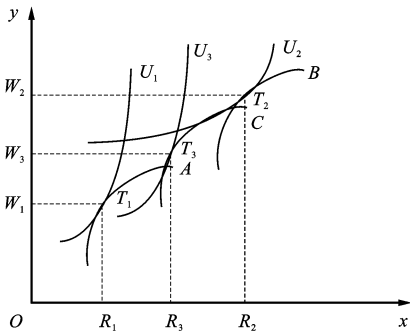


图 2 享乐主义工资模型: 不断向原点方向的动态化推进

3.1 改变矿工无差异曲线性状的对策

通过改变矿工无差异曲线的性状使其变得平

缓一些, 即曲线 U_2 向曲线 U_1 看齐, 假设其在转变过程中变成曲线 U_3 。显然曲线 U_3 的斜率大于曲线 U_1 , 而小于曲线 U_2 。曲线 U_2 的转变所代表的涵义是矿工对伤害风险关注程度的提高, 即矿工对于安全设备投资、自身生命保障更加的关注, 从过多地偏好货币收益逐渐转向偏好自身的生命安全。从图 2 可看出, 这一转变必然会带来货币工资的降低, 但是矿工仍然会“要求”这种变化, 那么要想让矿工发生这种偏好的改变, 除去自身的因素, 政府主管部门和社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本文认为, 政府要着力改善社会整体就业环境, 提高农民工的整体工资待遇水平, 强化农民工保险意识, 开展思想教育活动等。

3.1.1 改善社会总体就业环境, 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近几年, 由于中国城镇国有、集体企业经营体制的改革, 打破了过去“铁饭碗”的收入分配模式, 企业大多获得了用人自主权, 大量沉冗人员从原有单位中释放出来, 加之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把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 涌向城镇。两股人员在城镇“汇集”起来, 严重冲击了劳动力市场, “就业难”就成为当今中国最突出的社会矛盾。劳动力的严重富余与有限的就业岗位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降低了社会总体工资水平; 另一方面造成了职工的许多正当权益得不到很好的保护。

在煤炭采掘行业中, 许多矿工都抱着“能挣到钱就不错”的想法, 对其本身应享有的各类劳动保护和正当权益根本不予关心, 表现为过分的货币工资偏好, 而忽视了伤害风险,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中小煤矿企业。因此, 从根本上讲, 改善中国社会总体就业环境, 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 让更多的劳动力不是因为别无选择而被迫进入危害风险大的中小煤矿企业, 使他们不是因为“走投无路”而被迫成为“货币偏好型”。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应该拿出更多的优惠政策鼓励一部分农民工创业, 各类企业应该打破用工制度上对于农民工的歧视, 让更多的农民工参与到社会的各行各业。农民工就业渠道的拓宽必然会降低其对于某一些危险程度很高而又得不到有效保障的行业或企业的依赖。

3.1.2 提高农民工社会整体薪酬水平

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 中国改革开放近 30 年来, 农民工虽然实现了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 但其劳动薪酬水平却没有获得很大的提高。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20 世纪 90 年代普通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为 400 ~ 500 元; 近 20 年过去了, 现在仍然存在着四五百元

的工资结构,同时一般劳动者的平均工资水平也不过千元左右,这与整个社会的总体快速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煤炭采掘行业工人的工资水平与同等人力资本水平的其他行业相比,算得上是“高工资”了,意味着矿工的机会成本很低。矿工虽然知道所从事的行业风险程度很高,但是仍然会加入其中,尤其是进入一些中小煤矿企业的更是不得不为之。因此,提高农民工社会整体薪酬水平就显得非常重要,并以此提高矿工的机会成本,增加矿工同矿主谈判的筹码,迫使矿主提高煤矿安全设备投资水平,从而降低煤矿事故发生概率。现在中国许多城市实行的“最低工资制”便是很有意义的措施,能够起到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劳动收益权的作用。

3.1.3 开展思想教育活动,堵住不规范就业渠道

在煤矿行业大力开展矿工权益维护、宣传活动,让更多的矿工知晓其自身应享有的各类合法权益,敢于同矿主就生命安全保障在内的各类权益展开谈判活动。各级工会组织应积极地对矿工进行思想教育,扭转他们过分的货币工资偏好和对危险程度的低厌恶特征,让矿工更加珍惜自己的健康和生命。社交媒体要加大对那些非法煤矿的监督,对瞒报、少报死亡事故的矿主给予充分曝光,堵住非法用工渠道,切实保障矿工的合法权益。

3.2 改变中小煤矿企业等利润曲线性状的对策

通过改变中小煤矿企业等利润曲线的性状,使其变得陡峭一些,即图2中曲线 B 逐渐向曲线 A 看齐,假设其在转变过程中变成曲线 C ,显然曲线 C 的斜率大于 B ,而小于 A 。在图2中,曲线 B 代表的是中小煤矿企业,由于这些煤矿企业缺乏基本的安全保障措施,所以伤害风险程度较高(即 R_2),但其支付的工资也较高(即 W_2)。现在要使曲线 B 向曲线 A 转变,即意味着中小煤矿加强了安全生产保障措施的投入,降低了煤矿的伤害风险程度。这对矿工来讲是非常好的事情(即使矿工的工资水平也必然会随之降低),但在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的中小煤矿企业那里如何才能实现呢?本文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几点措施。

3.2.1 资源税收优惠和奖励政策

针对那些在煤矿安全设施方面投资比较多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资源税收优惠,以此激励中小煤矿矿主充分重视安全生产。资源税收优惠的标准可以依据其安全投资的比例来确定。地方煤矿监管部门要定期、不定期地对中小煤矿企业安全投资数额进行监督、审计,严厉打击弄虚作假,确保资源税收优惠

政策的确实落实到那些真正进行安全设备投资的煤矿。在此基础上,对连续几年没有发生重大煤矿事故的中小煤矿进行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奖励,以此激励更多的矿主进行安全设备投资。

3.2.2 严肃监管纪律,加强煤矿监管

近几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煤矿事故的发生对于经济运行的破坏作用越来越明显,其间接经济损失数倍甚至数十倍于直接经济损失。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矿难所引发的经济损失约占当年GDP总量的2%。因此,加强煤矿企业尤其是中小煤矿企业的安全监管显得越发重要,各级煤矿监管部门要严肃监管纪律,切实加强中小煤矿企业的监管力度,从根源上彻查那些没有进行安全设备投资的中小煤矿,确保煤炭生产行业的正常运营。

3.2.3 逐步提高煤矿事故死亡赔偿标准

近几年中国逐渐提高了煤矿事故死亡赔偿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对遏止煤矿事故的发生起到了良好作用。目前,各省市比较普遍的赔偿标准是20万/人。实际上,在部分地区仍然达不到这个水平,甚至是大大低于这个流行标准。笔者认为目前的死亡事故赔偿标准还很低,起不到应有的“威慑”作用,因为在腰缠万贯的煤矿主眼里,20万/人和他们日进“斗金”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因此,应该逐步提高煤矿事故死亡赔偿标准,让那些没有进行安全设备投资的煤老板“死不起人”,对其进行严厉的经济制裁,直至倾家荡产。

3.2.4 签定长期合约,避免短期行为

签定长期合约有利于矿主进行煤矿安全设备投资。在短期合约之下,矿主不敢对承包的煤矿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因为他们不敢确定下一个承包周期是否还能继续干下去,如果是别人承包,那么先期的安全设施投资就有可能“为他人做嫁衣裳”,所以矿主在短期合约框架下完全没有进行安全设备投资和大规模技改的动机;而长期合约则恰恰相反,能够充分调动矿主安全投资的积极性,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矿难的发生。

3.2.5 强化工会维权意识,推动矿主安全投资决策

现代工会理论认为,工会作用机制的加强对于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组织保障作用。工会组织要充分听取员工的意见和建议,并有效地传递给企业管理层,切实代表员工的利益;及时向员工传达最新的方针政策,确保员工知晓自身所享有的各项权益。在煤矿企业中,要充分发挥企业工会和

(下转第16页)

路上的损失,这时政府不再补贴^[10]。

5 结 语

高速公路收费的历史说明,公路收费是政府不得已而采取的对策,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能力大量修建公路时才会采取收费的方式。在这个表面现象下面掩盖着这样一个事实:政府是在免税制度下的转移损失和收费制度下的福利损失之间进行权衡,只有政府认为目前税率足够高了,没有再行征税的余地时才会选择收费制度。而足够高的税率和民众不允许再行征税正是意味着再行征税的转移支付损失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参考文献:

- [1] 许如清.公路经营企业的财税政策[J].中国公路学报,1999,12(1):54 55.
- [2] 谢军占.非收费公路可持续发展中的资产管理问题研

究[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4):9 13.

- [3] 曹军念.中国公路收费经营与政府行业管理相关问题[J].交通运输工程学报,2001,1(4):92 95.
- [4] 任选平.如何认识公路收费权[J].经济师,2003,18(3):28 29.
- [5] 周国光.收费公路发展问题研究[J].中国公路学报,1997,10(1):122 125.
- [6] 李颜娟.收益法和成本法评估公路收费权结果的趋同性分析[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4):14 17.
- [7] 邓淑莲.中国基础设施的公共政策[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 [8] 周国光.论公路收费权价值的确定[J].综合运输,1999,21(12):31 36.
- [9] Stopford M. Maritime economics[M]. London: Transportation Press, 1992.
- [10] 周国光,李颜娟.规范公路收费转让行为的政策研究[J].中国公路学报,2005,18(4):104 105.

(上接第 11 页)

煤炭行业工会的双重作用,切实维护好广大矿工的合法权益,就安全设备投资、矿工人身保险、职业病防范在内的各项措施和权益同矿主展开谈判,最终推动矿主安全投资决策,最大限度地减少矿难的发生。

4 结 语

在中国煤炭行业经营体制转变和社会整体就业环境不容乐观的大环境下,矿难频发的背后蕴藏着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平衡因素,主要表现为充足的矿工劳动力供给特征。本文从矿工的特定劳动供给行为和矿主基于利润最大化的劳动需求行为出发,运用享乐主义工资模型对矿难问题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在此基础上,本文相应地提出了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享乐主义工资模型的动态化改进,即改变矿工“高工资—高风险”的偏好和矿主不情愿进行包括矿工安全技能培训和安全生产设备投资在内的各项成本支出的偏好。本文认为,治理矿难问题只有从这两个方面着手方能达到治本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 伊兰伯格·史密斯.现代劳动经济学——理论与公共政策[M].张凤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 [2] 雅各布·明塞尔.劳动供给研究[M].张凤林,译.北

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 [3] 王庆一.美国政府如何管理小煤矿[J].煤炭经济研究,2005,25(3):4 6.
- [4] 康纪田.对矿难背后深层次问题的思考[J].探索与争鸣,2005,21(5):28 2.
- [5] 任光明.公用地的悲剧:山西矿难的深层次思考[J].财经论坛,2003,19(10):29 30.
- [6] 张中强.借鉴 DADS 法加强煤矿安全监管力度[J].煤炭经济研究,2002,22(5):53 54.
- [7] 王绍光.煤矿安全生产监管:中国模式的转变[J].比较,2003,21(13):79 110.
- [8] 谭满益.产权扭曲:矿难的深层次思考[J].煤炭学报,2004,12(6):756 759.
- [9] 赵杰.换一换遏止矿难的思路[J].南风窗,2005,21(3):18 19.
- [10] 方晓波.矿难背后的经济学思考[J].煤炭经济研究,2005,25(4):79 80.
- [11] 孟淑萍.矿难暴露人力资源开发的落后[J].瞭望新闻周刊,2004,24(51):59 60.
- [12] 钟开斌.事故瞒报的运做逻辑[J].公共管理学报,2005,2(2):62 66.
- [13] 窦永山.英国的煤矿安全监察体制[J].当代矿工,2002,7(4):34 35.
- [14] 杨凤春.政府对矿难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J].决策咨询,2004,15(12):28 29.
- [15] 肖志兴.煤矿安全监管的纵向与横向配置:国际比较与启示[J].发展研究参考,2006,3(7):16 36.